

陈得芝 著

蒙元史研究丛稿

人
民
出
版
社



陈得芝 著

蒙元史研究丛稿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乔还田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赵立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元史研究丛稿/陈得芝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ISBN 7-01-004562-3

I. 蒙… II. 陈…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元代-文集
IV. K24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3263 号

蒙元史研究丛稿

MENGYUANSHI YANJIU CONGGAO

陈得芝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24.5

字数:677千字 印数:0,001-2,000册

ISBN 7-01-004562-3 定价:5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1960年研究生毕业前后,我开始在韩儒林先生指导下参与《元史纲要》的编撰,1963年又承接了历史地图(蒙古地区)的编绘任务。这些集体项目都持续多年,工作中深感自己根底薄弱,必须加紧补课,资质属于孔夫子说的“困而学之,又其次也”一类,尽管勉力从事,犹常感左支右绌,偶有一得之见,大多是附骥前贤成果编入书中,不大敢单独撰为专题论文。1977年韩先生创办南大元史研究室的《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0年全国性元史研究会成立后又出《元史论丛》,我作为一个成员,不能不提供稿件;此外,每次参加学术会议,以及师友们主编书刊或为前辈出祝寿纪念文集等的约稿,都促使逐年写些文章。自知其中许多很不成熟,但拿出去总算交了卷,并不期望成就“名山事业”。偶尔翻检旧作,总是愧赧多而满意少,所以未曾想过要出论文集。有朋友提及此事,辄惶恐却谢。

去年,同事和朋友们再提此议,意谓学者们研究中涉及我曾讨论过的问题,总要找我的文章参考评说,这是学术规范的要求,编成一集可免学者查寻之劳。我这才反思,对自己写过的东西要负责,不能一味藏拙,况且年届古稀,对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也该做个检讨。同时,时常收到国内外朋友赠送的著作,一直无以为报,出一本集子请他们批评指正,或可略为弥补亏欠,于是勉强编集了这么一本。凡与人合撰的,概述性或内容重复的文章(如《元代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元代的钞法》等篇,主要内容都见于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和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八卷),以及译作和为朋友写的书序,一般都不收。所收文章,除错字和个别脱误必须补正者外,基本上不作改动。凡补正处皆用方括号标出。

南大民族与边疆研究所将此书的出版列入计划,所长刘迎胜教授尽心谋划,费力甚多;南大社科处和处长柳士镇教授给予了大力支持,华涛教授、刘月莲博士也力赞此事;特木勒博士、沈仁国教授和周萍萍博士等都给了很多帮助。同行专家、人民出版社陈有和副社长亲自审阅书稿,提出宝贵意见。此书的出版,完全得力于众多同事和朋友的促成与支持,谨表诚挚感谢。蔡美彪先生不弃鄙陋,惠允题写书名,感激不尽。

元好问有句诗:“文章得失寸心知”。我没有这样的自信,出这本集子的目的是希望得到学者们的指教,如果他们有兴趣读本书中任何一篇文章并提出批评意见,都是对我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无比欢迎之至。

我生性笨拙,有朋友戏称为“纯儒”,除了读几本书就一无所能。几十年来,饮食起居,全赖内子洪兴慧老师悉心照料。編集此书期间,我在电脑上校阅文稿弄得头昏眼花,她常提醒休息并煮好点心伺候;有时心烦想放弃,她又鼓励我不可辜负同事朋友们的盛情和期望,终于坚持编完。人们常说有个好老伴是老年幸福的首要条件,人生有此,夫复何求!

陈得芝

2004年5月18日写于乐友斋

目 录

前言	(1)
----------	-----

蒙藏史地考证

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	(3)
关于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	(19)
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	(25)
元和林城及其周围	(39)
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	(44)
元称海城考	(55)
蒙古部何时迁至斡难河源头	(61)
元代北方三测景所地理略述	(68)
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	(77)
元外刺部《释迦院碑》札记	(89)
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设置年代	(101)
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	(113)
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中)	(137)
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下)	(170)
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	(201)
元代内地藏僧事辑	(233)
读伯希和译注八思巴字怀宁王海山令旨	(252)
赤那思之地小考	(266)
蒙古哈答斤部撒勒只兀惕部史地札记	(270)

再论乌思藏“本钦”	(281)
再论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的初期接触	(307)
八思巴初会忽必烈年代考	(315)

历史文化与中西交通

试论郑和下“西洋”的两重任务	(335)
元代艺事杂录(二则)	(343)
傀儡家世业	(343)
胡祇遒唱论	(344)
沙俄对“江东六十四屯”的侵占	(346)
关于方腊的所谓“漆园誓师”	(356)
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	(360)
——试论阿兰答儿钩考的前因后果	
从“遗民诗”看元初江南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374)
元代江南之地主阶级	(395)
“杂剧”一释(札记)	(409)
元代海外交通的发展与明初郑和下西洋	(411)
从“九儒十丐”看元代儒士的地位	(424)
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	(430)
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识(四则)	(448)
回回户与答失蛮户	(448)
“于阗人”泛指中亚人	(452)
赛典赤瞻思丁事迹补	(455)
《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	(457)
蒙元史读书札记(二则)	(462)
五户丝增额并非始于中统元年	(462)
耶律铸生平中被掩盖的一段经历	(464)
耶律楚材诗文中的西域和漠北历史地理资料	(468)

李志常和《长春真人西游记》·····	(479)
何秋涛及其《朔方备乘》·····	(487)
牙老瓦赤卒年补证·····	(498)
论元代的“诗禅三隐”·····	(502)
元仁宗时教皇使者来华的一条汉文资料·····	(524)
马可波罗补注数则·····	(529)
程钜夫奉旨求贤江南考·····	(540)
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	(571)
淮上农民起义与集庆“花山贼”·····	(596)
郑和下西洋年代问题再探·····	(599)
——兼谈郑和研究中的史料考订	
常德西使与《西使记》中的几个问题·····	(613)
耶律楚材、刘秉忠、李孟合论·····	(631)
——蒙元时代制度转变关头的三位政治家	

学 术 评 论

对史学评论应有正确认识·····	(667)
——“史学评论”笔谈	
韩儒林先生与我国元史、西北民族史研究的进步·····	(669)
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680)
重刊《穹庐集》前言·····	(682)
罗沙比《忽必烈传》及《剑桥中国史》相关部分史实商订·····	(690)
蒙元史研究与中西学术的会通·····	(707)
《嘉定钱大昕全集》元史著述部分点校勘误·····	(721)
《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序·····	(738)
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划时代进步·····	(743)
——纪念《中国历史地图集》边疆图组的几位前辈学者	

附 录

师德追思录	(755)
我与蒙元史研究	(768)



蒙藏史地考证

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

一、引言

元朝实现了全国大统一，驿传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元朝政府为加强对边区的统治，驿道的设置东北达到奴儿干地区（今黑龙江口），西南通至纳里·速古儿孙（今西藏阿里地区），北方设到吉利吉思等地（今叶尼塞河上游）。驿道分布之远，为前代所未有。

岭北行省是元朝统治集团的“兴王故地”，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有通到内地和西域的驿路^①。元太宗窝阔台建都和林（今蒙古额尔德尼召）后，进一步完善驿站制度，设置了和林到中原地区的驿道，每七十里左右置一站，由一个千户负担站役，共设三十七站^②。又设置了从和林通到察哈台封地（今新疆西部），再从察哈台封地通到拔都封地的驿道^③。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兴（后改大都，今北京）后，岭北地区虽然失去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而成为边区^④，但仍然是北方重镇。分布在岭北各地的诸王、贵戚，每年都要乘驿来上都朝会，此外，诏使往返，官吏迁转，军队调动，粮饷运送，也大多经由驿道，来往极为频繁。因此，元朝政府屡次整顿岭北行省与中原地区间的驿道，使其成为联系腹里和北疆的经流不息的大动脉。

① 参见《长春真人西游记》。

② 拉施都丁：《史集》第二卷，页四一（本文所引《史集》均据俄译本）。

③ 《元朝秘史》第二七九节。

④ 忽必烈平定阿里不哥后，于和林置宣慰司都元帅府，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改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元朝政府文件中多称岭北为“边远之地”。

弄清楚岭北行省几条驿道的路线,对了解元代北方地区和中原的紧密联系,了解元代全国交通网的分布,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元代有关岭北行省的资料十分缺乏,我们目前还只可能根据零星的文字记载,结合考古发现,对驿道的路线作一概略的说明。

《元史·地理志》记载岭北行省总共三百多字,关于驿道,只有寥寥数语:“北方立站:帖里干、木怜、纳怜等一百一十九站。”帖里干(蒙语“车”)、木怜(蒙语“马”)、纳怜(蒙语“小”)是中原通往岭北的三条驿道名称,而不是站名。据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年)的一个文件记载,帖里干道有五十七站,木怜道有三十八站,纳怜道有二十四站,通计一百一十九站^①。与《元史·地理志》所载合。

三道中的纳怜道是“专备军情急务”而设的,规定只许“悬带金银字牌面,通报军情机密重要使臣”经行,其余一切人员则只能由“兀鲁思两道”来往^②。纳怜道的路线大致是出东胜(今内蒙托克托县),溯黄河而西,穿过甘肃行省北部,直达西北边境,因为这条驿道的大多数站都在甘肃行省境内,故常被称为“甘肃纳怜驿”。

所谓“兀鲁思两道”(兀鲁思,蒙语“国家”、“人民”),就是帖里干道和木怜道。这两条驿道都是从腹里通到和林地区,但所经路线不同,一条是东路,一条是西路,所以常被称为“东、西两道站赤”^③。元代岭北行省与内地的交通,主要是依靠这两条驿道。

二、帖里干站道

帖里干站道是“兀鲁思两道”中的东道。这条驿道的路线是:从起点站大都至上都(今内蒙古正兰旗昭乃门苏木),北行经应昌路(今内蒙古

^① 《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页一二。以下所引《站赤》,均注《永乐大典》卷、页码。

^② 同上书,页四,延祐元年文件。

^③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页一一,延祐七年文件。

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南),折西北至克鲁伦河上游,转西行到达鄂尔浑河上游的和林地区。为了比较清楚地勾画出这条驿道的路线,下面分成几段来叙述。

第一段:从大都到上都

元代从大都到上都有四条路。

一是西路。从大都西北行,经宣德、宣平,出野狐岭(今张家口西北膳房堡北),过抚州(今河北张北县),转东北行至滦河上游。中统以前,这条路是“正站”,凡使臣、官员乘驿均取此道^①。丘处机、张德辉等人奉召北上,都走这条路。张德辉记载说:“出扼胡岭(即野狐岭),下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②这是一二四七年的情况。到中统初年,这条路还被称为“孛老站道”,当是取野狐岭北第一站之名作为此段驿道的名称。到中统三年(一二六二年)改以望云道为驿路正站,孛老道才变成“专一搬运段匹、杂造、皮货等物”的运输路^③。不过元朝皇帝每年秋初从上都回大都,往往也走这条路,所以它又被称为“纳钵西路”^④。

一是黑谷路。也是从大都西北行,至龙门站与西路分叉,转北行出黑谷,至牛群头站(亦名失八儿秃,蒙语“有泥淖”,在独石北七十里石头城子)与驿路合辙。元朝皇帝每年夏初从大都去上都多走此道。

一是东路。自大都东北行出古北口,经宜兴州(今河北滦平县北兴州村小城子)、东凉亭(今内蒙多伦县北白城子)至上都,是“东道御史按行”之路^⑤。

还有一条就是驿路正站——帖里干站道的第一段。中统元年,为了在大都和上都之间“速取径道”,立望云、独石等站为“海青站”,只许有急速公

① 《站赤》，卷一九四一六，页一〇——。

②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〇，《张耀卿纪行》。

③ 《站赤》，卷一九四一六，页一二。

④ 周伯琦：《近光集》。

⑤ 周伯琦：《近光集》。

事携海青牌者行走。到中统三年整顿“开平站路”(开平即上都),遂正式以望云道取代孛老道为驿路正站,并被称为“帖里站”(即帖里干站道)^①。有元一代,许多官员来往于大都上都之间,奔波在这条路上,写了大量纪行诗文,各站的位置都比较明确。据《站赤》及《析津志》记载,驿道出独石口后,经牛群头、察罕脑儿(明安驿,今河北沽源县北小红城)^②、李陵台(今内蒙正兰旗南黑城)、桓州(今正兰旗北四郎城)四站,达于上都。

第二段:上都至鱼儿泊(应昌路)。

上都未建以前,从中原地区到漠北去的东路都是出野狐岭,经过抚州、昌州,越过昌州北的金界壕,向东北行至鱼儿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复折西北行至克鲁伦河上游,西转达和林。这条路被称为“鱼儿泊驿路”^③,一二四七年张德辉北行就是这样走的。

上都建成以后,驿路改由上都北上,是否还经过鱼儿泊呢?虽然目前我们还未发现帖里干道上有鱼儿泊站名,但根据其他资料分析,无疑仍然是经过的。中统元年,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其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自立,两兄弟发生了南北战争,忽必烈派遣大军北征,下令西京诸路运粮集中于沙井,燕京诸路运粮集中于鱼儿泊,以供应北征军^④。足见鱼儿泊是这条通路上的枢纽站。《元史》卷一六五《张立传》记载:“〔至元〕十四年春,〔张立〕率步卒十人(按:应是“千人”)转粟赴和林,道出应昌,会酋帅畔,谋不轨,以射士三千踵其后,欲乘间夺其资粮。立觉有异,急命环车为栅以备之。贼众已合,矢如雨下。初立之发上都也,每车载二板以备不虞,至是建板于车,矢不能入。”按应昌路即在鱼儿泊(《元史·特薛禅传》作答儿海子)旁,因此,所谓“道出应昌”,也就是道出鱼儿泊。张立运粮去

① 《站赤》，卷一九四—一六，页一二。

② 察罕脑儿(蒙语：“白湖”)是元代著名行宫所在地，即今沽源县北之囿囿诺尔。诺尔东北之红城子古城，即元代察罕脑儿行宫遗址。日人箭内互：《元代之东蒙古》一文中，以沽源县西百余里之小碱滩为察罕脑儿，误。

③ 《长春真人西游记》。

④ 《元史·世祖本纪》。

和林无疑是走帖里干道,这证明帖里干道和中统以前的驿路一样,也要经过鱼儿泊这一站。

上都至鱼儿泊这段驿路上设了哪些站,找不到明确记载。丘处机、张德辉过金界墙后行十一驿至鱼儿泊,从上都至鱼儿泊比前路近些。延祐六年四月的一个文件记载,帖里干站道内伯只刺、愁赤海两站头匹倒死,失误走递,命上都留守司官员会同通政院给付价钞买马供役^①。是此两站应在上都与鱼儿泊之间。元太仆寺所属十四处牧地中的“玉你伯牙上都周围”一处,有伯只刺牧场,伯只刺站应在此牧场附近。上述延祐六年文件中提到苟赤人(译言“牧牝马者”)也速答儿以己马给助伯只刺站役,可能就是伯只刺牧场的牧者。至治末年,伯颜之孙相嘉失礼省先莹于白只刺山,闻变赴上都,为发动政变者所拘^②。此白只刺应在上都之北不远处,当即伯只刺站、伯只刺牧场所在地。

第三段:从鱼儿泊到克鲁伦河上游。

一二二一年丘处机从呼伦湖溯克鲁伦河西行至上游河曲,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载,此处“西南接鱼儿泊驿路”(按“西南”应作“东南”),一二四七年张德辉北上和林,就是走的这条“鱼儿泊驿路”。据其所作《纪行》,从鱼儿泊西北行四驿,见一列界墙自东北来,向西南逶迤而去;过界墙复西北行十五驿,抵翁陆连河(又名驹河,即克鲁伦河),河之旁有土屋,汉蒙杂居于此,以种植为业。考古工作者于今内蒙古阿巴嘎旗之北,发现一段金代界墙,估计东北伸展到东乌珠穆沁旗之北,西南延伸到苏尼特旗之北[补注:今大比例尺地图尚标有此“长城”断断续续的遗迹],其位置正在达里诺尔西北约三百里,无疑即是张德辉所见到的界墙遗址。又今克鲁伦河上游,温都尔罕之西发现二座辽代城址,周围有耕屯遗迹[补注:参见[蒙古]培尔勒《蒙古境内的辽代城市和居民点》],应即张德辉所至之处。

^① 《站赤》,卷一九四二一,页一一。

^② 《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

帖里干站道既然也经过鱼儿泊,则鱼儿泊以北的驿道,应与张德辉所走的早期驿道大致相同。这段驿路上可考的几个驿站可以证明这一点。

至元十四年,因北边藩王昔里吉等叛乱,忽必烈命刘国杰“统侍卫军万人北征”,“师次益图,大雪,环车为栅,穴地与士卒同卧起。”^①刘国杰此行从上都出发,走的应是帖里干道(即车道)。考明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以北元太尉乃儿不花等为患,遣燕王朱棣往讨之,三月朱棣军至迤都之地,乃儿不花等兵败归降^②。永乐八年四月朱棣北征过此,命人在山顶大白石上刻了“擒胡山”、“灵济泉”几个大字,并亲自写了铭文刻在白石上^③。据此知“擒胡山”即“迤都”之地。清康熙北征噶尔丹也经过这个地方,看到了永乐的刻石,于是也亲自写了铭文刻在大白石上^④。在当时测绘的《皇舆全图》上,还特地标上了“察罕七老碑”(译言“白石”)这个地名(西三度十分,北四十五度五分,即东经 113°35′ 北纬 45°5′)。朱棣和康熙的刻石至今尚存,在达里甘嘎之南的朱勒格特山达(又名察罕七老)地方^⑤。这个地方在鱼儿泊(达里诺尔)西北约六百多里。如前所述,元代的驿路正是从鱼儿泊向西北走的,可见明初的迤都(擒胡山)——清代名察罕七老山,和元至元中刘国杰行军所经益图之地,地名、方位都完全相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元、明、清三代度漠通道必经之地,元帖里干站道毫无疑问是经过这里的。[补注:一九八八年日本学者堀江雅明发表《ホクシン = テール碑と宣威军城址》(《东洋史苑》30—31 合号)一文,根据 1926 年科兹洛夫在蒙古翁金河上游杭爱山南麓 Khogshin Teel 山发现、后经蒙古学者继续调查的至元十五年所建“宣威军”城址和碑刻,考证碑文记载的侍卫军驻屯和建城处之“亦都山”,就是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记载的

① 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八,《刘国杰神道碑》。

② 《明实录》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丁卯,三月癸巳条。

③ 同上书,永乐八年四月壬子条;金幼孜《前北征录》。

④ 张诚:《扈从蒙古行记》(都阿德:《中华全志》卷四,页三一五,一七三五年巴黎版)。

⑤ 卡萨克维奇:《明清征蒙史资料》(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札记》第二卷第三期,一九三三年列宁格勒版)。